

#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妇女经济及家庭地位的影响 ——以湘西山区的三个行政村为例

刘文明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75)

**摘要:**对湘西山区3个行政村进行个案研究,发现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妇女的经济及家庭地位会产生影响。妇女在参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与妇女地位的高低呈正相关,但对妇女承担家务劳动影响不大。

**关键词:**农村; 经济结构; 妇女地位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3)03-0435-04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冲击到了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妇女扮演了什么角色?而这种经济变化对妇女生活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带着这些问题,2002年11月,笔者带领社会学系12名学生去湖南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社会调查。

## 一、问题的提出与个案选取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农村妇女问题也得到了社会学界尤其是女性学者的关注。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农村妇女的研究,或者着力描述她们受传统陋习束缚的一面,或者讴歌她们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贡献,而从经济结构调整对妇女生活影响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妇女地位的学者,也大多聚焦于外出打工的妇女。对于农村妇女参与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及相互影响的研究,笔者尚未见到这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当前学术界对农村妇女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学者们对东南部经

济发达地区或交通便利地区妇女生活的研究较多,而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妇女生活关注不够。笔者此次调查研究,选择湘西山区洪家关乡的3个村作为研究个案,以试图弥补这种不足。

桑植县隶属于湖南西部的张家界市,武陵山脉的北支与中支延伸其全境,有大小10426个山头,山区面积占全县83%。洪家关白族乡位于县城以北13公里处的一个山坳之中,面积70.32平方公里,下辖16个村,民族成份以白族为主,另有少数苗族、土家族和汉族等杂居。洪家关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处僻壤,交通不便,桑植县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因此,笔者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桑植县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现在正大力从事经济结构调整,笔者在洪家关调查时,乡政府正组织村民生产黄姜,发展订单农业。由于政府在倡导农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采取自愿原则,也就出现了不同村及同一村中不同农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快慢不一的情况。而这种状况,正好为笔者的对比分析提供了条件。在具有相同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乡村,经济结构调整较好的农户,和仍然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户相比,妇女的经济生活与地位有何不同?通过对比,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了解。

##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经典理论, 妇女要获得解放, 首先就得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与自主, 而要达到这一点, 妇女必须走出家庭去参加公共劳动。这种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阐发。她们认为, 妇女受压迫主要是由妇女在家庭内的传统地位造成的, 这种传统地位就是她们不能参与“社会”生产, 使她们陷入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之中。因此, 妇女的解放要求社会变革, 通过这种变革, 使妇女的私人劳动成为社会的公共劳动。

然而, 在以土地承包制为特色的中国农村, 如何实现妇女劳动从私到公的转变? 笔者认为,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此密切相关。众所周知, 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下, 农民生产的粮食主要用于自给, 而在小规模经营的山区尤其如此。由于山区地形的限制, 不具备大规模机械作业的条件, 一家一户的精耕细作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耕作方式, 没有规模效应, 如果只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 一方面生产成本高而效率低, 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又低, 那么粮食就只能用于维持农民的生计。在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情况下, 妇女也是这种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力量, 但由于农产品较少参与市场, 妇女的劳动也就只能是私人劳动了。然而, 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后的妇女劳动, 劳动性质却发生了变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是为了使传统农业适应市场化的需要, 以此来达到农民增收的目的。出于这一目的的生产, 即使仍是一家一户的生产, 但它已成为商品生产了。这样, 通过商品出售, 妇女的私人劳动也就成了公共劳动, 她们创造出了交换价值, 也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如此, 她们也就有能力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 实现独立与自主, 从而极大地提高自己的地位。

因此,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 ①经济结构调整的程度对妇女经济地位的高低有影响; ②没有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农户, 妇女的经济地位相对较低; 经济结构调整较好的农户, 妇女地位则较高。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 本文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 调查采样。采用典型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先是选择洪家关乡 3 个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村——A 村、B 村和 C 村, 以这 3 个村共 806 户为研究总体。然后, 对这 3 个村实行随机取样, 每个村

抽取 50 个样本。笔者与调查组成员主要采用入户访问法, 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 在随机选取的每户中任选 1 人作为调查对象, 选取范围为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具有劳动能力的妇女。调查组共发出问卷 15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150 份, 同时做了大量的访谈记录。由于这次调查研究立足于当地经济结构调整与妇女经济地位的关系, 因此将妇女外出打工或外地经商这一因素排除在考察之外, 虽然它是影响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2) 资料分析。①在对 A、B、C 3 个村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用 SPSS 对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用频数分析来验证妇女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及其经济地位; 对妇女所从事的主要劳动与妇女当家的情况进行相关分析, 以验证经济结构调整对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②以访谈记录为补充, 对上述假设做进一步定性描述。

## 三、样本分析与研究发现

首先对 A、B、C 3 个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做一对比分析。

A 村所在地有一个小小的集市, 每隔 3 天赶一次集。该行政村有村民 274 户, 共 970 人, 耕地面积 715 亩, 人均约 0.78 亩。由于人平耕地少, 再加上退耕还林, 农民收入主要依托集市经商和种植柑橘、蔬菜等经济作物, 因此商业在村民收入中的比重较大, 人均年收入在 1 200 元左右。B 村 205 户, 共 825 人, 耕地面积 870 亩, 人均约 1.05 亩。该村的经济结构调整, 主要着眼于农业内部的种植结构调整, 由种植水稻转为种植甘蔗、凉薯、藕等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已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人均年收入在 900 元左右。C 村有 327 户, 1 190 人, 耕地面积 1 188 亩, 人平近 1 亩。该村基本没有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仍以水稻种植为主, 人均年收入在 700 元左右。

以下 2 组数据(见表 1、表 2)表明, B 村和 C 村的主要经济来源靠种植业, 但前者以经济作物为主, 后者以水稻为主, 这是造成两村农户年收入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A 村 74% 的经济来源是打工或经商, 但家庭种植中有 70% 是水稻, 这主要用于自给, 无种植户的比率也较高。

在这种经济结构中, 妇女主要从事何种劳动? 本文所调查对象为在家从事生产的妇女, 平均年龄为 36 岁, 中位数为 38, 家庭规模以核心家庭为主, 也

有少数扩大家庭，户均人口4.3人。因此，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如表3所示）。

表1 A村、B村和C村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

	种植业	养殖业	打工或经商	其它
A	14%	0	74%	12%
B	46%	24%	21%	9%
C	51%	20%	27%	2%

表2 A村、B村和C村种植业中占主要地位的作物

	水稻	甘蔗等经济作物	果树	无种植
A	70%	2%	2%	26%
B	24%	50%	20%	6%
C	95%	2%	2%	1%

表3 妇女从事的主要劳动

	A		B		C	
	频数	%	频数	%	频数	%
家务	21	30	12	24	14	28
种植	3	6	8	16	6	12
养殖	0	0	1	2	1	2
家务与种植	5	10	15	30	11	22
家务与养殖	9	18	4	8	14	28
照看孩子	6	12	3	6	4	8
其它	6	24	7	14	0	0
Total	50	100	50	100	50	100

由表3可见，无论农村的经济结构如何，家务在妇女的劳动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经济结构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妇女从事家务的传统习惯。然而，这是否说明农村妇女仍以家务为主、社会生产劳动为辅？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其一，A村虽有30%的妇女回答以家务劳动为主，但由于这里地处集市，村民临市开店或摆摊设点者居多，这种主要由妇女从事的劳动，因为大多就在家中进行，与家庭劳动难以区别。而且，有24%的妇女回答了“其它”，即出售农产品或摆摊等其它劳动。笔者曾到一家柑橘种植户访谈，他家种了5亩柑橘，两个儿女正上学，柑橘树的培育等劳动均由夫妻共同承担，但在产品上市的季节，全由妻子负责在集市上销售。A村、B村和C村的农产品，主要由妇女负责销售。

其二，从B村来看，以种植劳动为主的妇女已达16%，如果把“种植”“养殖”“家务与种植”“家务与养殖”“其它”这5项相加，则已达70%，远远超过以家务劳动为主的妇女人数。当然，如果将“家务”“家务与种植”“家务与养殖”“照看孩子”这4项相加，所占比例为68%。这表明，无论妇女从事何种生产劳动，

劳动之余，家务活仍然由她们承担。这种情况，3个村都非常类似，表明妇女从事家务劳动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关系不大。

其三，笔者在访谈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您在5年前主要从事什么劳动？”被访问的妇女大多回答“干家务活”。而当问及她们现在有何变化时，一些人表示：“在照顾好家的同时，设法多挣点钱。”这也是市场经济冲击下农村妇女观念的变化，它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便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表4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了。妇女的劳动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相当大，而且与经济结构有关。A村有42%的妇女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B村为44%，而C村只有32%。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与兼顾家务是有区别的。以家务活为主的妇女，由于其劳动不能直接创造价值，其家庭地位便可能受到影响；但兼顾家务却不意味着妇女地位低下，表3显示妇女兼顾家务的比例较高，而表4却表明妇女的经济活动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只能说明，农村妇女的劳动量相当大，“里里外外一把手”的情况较多。

在所调查的150个样本中，当问及“您的劳动收入主要用于什么开支”时，有73%的人回答“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只有14%的人回答“用于自己消费”。由此表明，妻子已与丈夫一起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撑者，正因为如此，她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当家作主的人。

从表5可以看出：在A村和B村，由新一代主妇当家作主的家庭高达50%以上；在C村，妻子当家虽只占30%，但也比丈夫当家高出8个百分点。如果加上夫妻共同当家，3个村妇女管理家庭的比例都在60%以上。另一方面，3个村之间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经济结构调整较好的A村和B村，妇女当家的比例明显高于C村。

表4 妇女劳动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

	A		B		C	
	频数	%	频数	%	频数	%
主要地位	5	10	4	8	3	6
1/2	16	32	18	36	13	26
1/3	12	24	8	16	12	24
1/4及以下	14	28	19	38	22	44
未回答	3	6	1	2	0	0
Total	50	100	50	100	50	100

表 5 家庭中由谁当家作主(管钱和决定大事)

	A		B		C	
	频数	%	频数	%	频数	%
父亲(公公)	3	6	1	2	0	0
母亲(婆婆)	3	6	2	4	2	4
丈夫	10	20	14	28	15	30
妻子	25	50	27	54	19	38
夫妻共同	9	18	6	12	14	28
Total	50	100	50	100	50	100

农村妇女所从事的主要劳动与她们能否当家作主是否存在相关关系?通过对 150 个样本的分析,“妇女当家”与“家务劳动”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皮尔松相关系数为 -0.056,表明以家务劳动为主的妇女越多,当家作主的情况就越少。“妇女当家”与“照看孩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也仅为 0.029。相反,以养殖和种植为主要劳动的妇女,与当家作主都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107 和 0.086。虽然,数值表明它们之间的相关程度仍然较低,但比较而言,这 4 种相关关系的区别又是非常明显的。

#### 四、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的假设基本得到

了验证。以 A 村、B 村和 C 村为代表的内地山区农村,正在经历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对妇女的经济及家庭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妇女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经济结构调整较好的地方,有 40% 左右的妇女,其劳动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妇女当家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在商业收入占重要地位的 A 村,妇女地位相对较高;在农业市场化较好的 B 村,妇女地位次之;而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 C 村,妇女当家的程度相对较低。然而,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她们在与丈夫并肩劳动的同时,还要承担起料理家务的重任。她们同男了一样日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经济与家庭地位日益提高,但这完全是她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

#### 参考文献:

- [1] 金一虹,刘伯红.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李秋芳.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 [3] 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1997.
- [4] 桑植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桑植县志[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

## Influence of rural economic reform on women's

### economic and family status in China

### —A case of three villages in western Hunan province

LIU Wen-ming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western Hunan provinc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rur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ould exert an influence on women's economic and family status. In the process of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omen's status become higher.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tents of involving in rural market economy and women's status, but market economy did not free rural women from routine housework.

**Key words:** village; economic structure; women's status